

華人青少年前期兒童之間接攻擊行為的 反應評鑑與情緒經驗

王明傳 雷庚玲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論文編號：06060；初稿收件：2006年12月11日；第一次修正：2007年10月18日；正式接受：2008年1月13日
通訊作者：雷庚玲 106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E-mail: kllay@ntu.edu.tw）

本研究旨在發展一套有別於問卷形式的間接攻擊結構性訪談測量程序。依據社會訊息處理模式，本研究預期此訪談工具可區別青少年前期不同同儕地位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依據效益風險率假設，本研究預期男女生在遭遇間接攻擊後的情緒反應具顯著差異，也預期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具性別與同儕地位之交互作用效果。研究一共有56位國小高年級兒童參加個別訪談，結果顯示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的同儕地位效果量為中等，且遭遇間接攻擊行為受害的情緒經驗具有性別差異。研究二共有60位不同社會計量地位之國二生參加個別訪談，結果顯示性別與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之間的關係會受社會計量地位所調節，且遭遇間接攻擊的情緒經驗具有性別差異。研究三共有72位高、低間接攻擊傾向之小六兒童參加個別訪談，結果顯示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的性別和間接攻擊傾向之交互作用效果不顯著，且遭遇間接攻擊行為的情緒經驗具有性別差異。這三個研究都發現不同性別的兒童雖然在遭遇間接攻擊時的憤怒情緒沒有差異，但對於間接攻擊之困擾和難過情緒卻顯著不同。本研究另顯示性別與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之間的關係會受社會計量地位指標影響，卻與間接攻擊傾向程度的同儕地位指標沒有顯著關係。

關鍵詞：間接攻擊、關係攻擊、同儕地位、同儕關係、社會訊息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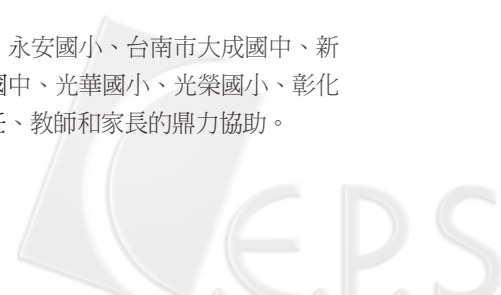
緒論

「間接攻擊行為」(indirect aggression)乃指攻擊者非以肢體或言語等當面或直接的攻擊方式傷人，卻以有意圖的社會操弄(social manipulation)、控制或毀損他人的社會關係等迂迴方式來傷害特定對象，使受害者因社會關係受操縱或被擾斷、社會聲

望受損及(或)遭受社會排擠而受苦或受害(Archer & Coyne, 2005; Crick, 1996; Lagerspetz, Björkqvist, & Peltonen, 1988; Underwood, 2003)。近年來學界對兒童間接攻擊行為的研究雖有重大進展(Werner & Crick, 1999)，但方法上仍有諸多值得改進之處，如：研究多採問卷施測，較常單純從性別差異的角度切入問題，且近來才開始從社會訊息處理的觀點探討

致謝

本研究感謝台北市芳和國中、雙蓮國小、信義國小、幸安國小、仁愛國小、台中市安和國中、永安國小、台南市大成國中、新興國中、新興國小、台北縣板橋國中、新竹縣竹東國中、富光國中、二重國小、南投縣南崗國中、光華國小、光榮國小、彰化縣大城國中、國聖國小、南興國小等全省廿所學校的學生參與本研究，以及學校的校長、主任、教師和家長的鼎力協助。



其可能涉及的前置因素等。再者，目前對於間接攻擊行為所累積的知識遠遠落後於肢體和言語攻擊行為。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發展一套具有效度且能探討間接攻擊行為背後的社會訊息處理及其涉及的情緒反應之測量程序，以探討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特定社會認知與情緒經驗。本研究目的在於建立一套有別於問卷形式的結構性訪談程序，並透過兩個面向檢驗其效度：一為檢驗不同社會適應類型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response evaluation）歷程之差異性。二為以發展論和演化論的「效益風險率假說」（effect-to-danger ratio hypothesis）（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1992; Campbell, 1995, 1999; Prescott, 1996）為基礎，檢驗間接攻擊行為的同儕事件對於兒童的情緒反應之性別差異。此外，亦將檢驗不同性別及不同社會適應類型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之交互作用，以進一步釐清性別以外的其它變項是否同時與性別因素對間接攻擊行為的社會訊息處理產生作用。

（一）攻擊行為的性別差異

早在1980年代中期，芬蘭的研究團隊（Lagerspetz et al., 1988）即已察覺過去有關人類攻擊行為的研究產生了嚴重的失衡，比如：太多的研究把焦點放在男性的攻擊型態（即直接的肢體攻擊行為），相對的，女性的攻擊行為類型往往不是焦點所在（Björkqvist, 2001）；太常僅以男性為研究對象（Björkqvist, 1994; Björkqvist, 2001; Björkqvist & Niemelä, 1992; Underwood, Galen, & Paquette, 2001）；即便女性也納為研究對象的實驗中，攻擊的操作型定義也幾乎皆以肢體攻擊作為界定的範疇（Björkqvist, 1994; Björkqvist & Niemelä, 1992）；甚至從事這個議題的研究人員大多也是男性的學者（Björkqvist, 2001）。然而，近幾年的實徵研究結果（如：Björkqvist, 1994; Crick, 1996; Crick & Grotpeter, 1995; Grotpeter & Crick, 1996; Lagerspetz et al., 1988）才真正開始動搖「女生沒有攻擊性」這個本質上即可能為偽的基本設定。目前已有研究顯示外顯的肢體攻擊的確比較是男生的攻擊行為特性，但較為隱諱的間接攻擊行為卻是女生比男生更具代表性的攻擊行為特性（Crick & Grotpeter, 1995; Crick et al., 1999; Lagerspetz et al., 1988）。換言之，以往的研究之所以未能發現女生的攻擊性，是因為過去對攻擊行為的界定方式與分類方法過於狹隘所致。事實上，男女生一樣都具攻擊性（Björkqvist, 1994），只不過男女生表現攻擊的方式或型態不同罷了（Björkqvist, 1994; Crick & Grotpeter, 1995），但

是若把間接攻擊視為女性專屬且把肢體攻擊視為男性專屬，如此粗糙的二分切割也不正確（Björkqvist, 2001），因為女生也會有肢體攻擊。此外，另一組研究人員（Galen & Underwood, 1997）發現：男生不但也有間接攻擊行為，其出現頻率不下於女生，且隨年齡增長，間接攻擊行為的出現頻率也隨之增多。只不過目前實徵研究對間接攻擊行為性別差異的發現相當分歧。有研究（如：Björkqvist, Lagerspetz, & Kaukiainen, 1992; Björkqvist, 1994; Crick & Grotpeter, 1995; French, Jansen, & Pidada, 2002）發現女生的間接攻擊行為多於男生，也有研究（如：Björkqvist, Österman, Oommen, & Lagerspetz, 2001; Henington, Hughes, Cavell, & Thompson, 1998; McEvoy, Estrem, Rodriguez, & Olson, 2003; Tomada & Scheider, 1997）發現男生的間接攻擊行為多於女生，甚至還有一些研究（如：Paquette & Underwood, 1999; Rys & Bear, 1997; Toldos, 2005）發現間接攻擊行為的發生並無性別差異。本研究認為，這些互相矛盾的性別差異研究結果，或許來自其它與間接攻擊行為有關的內在認知因素未在研究中受到考量之故；亦即，除了性別因素外，社會訊息歷程可能亦是造成間接攻擊行為發生與否的原因之一（Crick, 1995）。

（二）社會訊息處理與間接攻擊行為

近年來，對於兒童攻擊行為的研究結果顯示，攻擊行為的發生是同儕互動與知覺者詮釋該互動之間的一連串交互作用的結果（Dodge & Schwartz, 1997）。換言之，具有不同社會適應狀況的兒童（例如，「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兒童」相對於「受同儕喜愛的歡迎型兒童」；「高攻擊傾向的兒童」相對於「低攻擊傾向的兒童」）的攻擊行為個別差異，不僅反映在最後是否及如何表現出攻擊行為，也反映在其對於同儕互動事件的收錄（encoding）、心理表徵，以及攻擊行為反應之通路或建構（response access or construction）與決策等心理歷程（Dodge, Coie, & Lynam, 2006）。依據社會訊息處理模式（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以下簡稱SIP模式）的主張（Crick & Dodge, 1994），兒童對於情境的理解和詮釋會影響其當下的社會行為，且個體對社會訊息的處理大致涉及六個步驟，分別為內外線索的收錄、對這些線索的詮釋和心理表徵、目標的澄清或選擇、反應通路或建構、反應的評鑑與決策，以及行為的展現（behavior enactment）。雖然該模式假定每一個社會認知歷程步驟的發生不但相當迅速，且以無數的回饋迴路平行處理著，但為方便說明這些歷程，以

下仍以序列方式簡述之。當兒童注意、收錄以及解釋了社會線索時，社會訊息處理於焉開始。比如：當一位兒童從教室外面的走廊經過，無意中聽到有人正在說他的壞話（注意、收錄）。這時候這個兒童必須先理解當下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何它會發生（詮釋：故意的或者無心的？善意的或者惡意的？）。接著，兒童對當下情境所形成的目標便會逐漸明朗，比如，若覺得對方是惡意的，目標可能是閃避對方，也可能是想立刻與對方斷絕往來。接著，兒童便會對當下的情境形成種種可能的反應，並會依據個人對這些反應的預期結果、與目標的關連性，以及執行該反應的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對這些可能的反應方式進行評估。最後，獲得兒童最高正面評價及最青睞的反應便會以行動表現於外。

雖然過去研究兒童攻擊行爲的社會認知歷程多以肢體攻擊為主，但SIP模式應亦可解釋間接攻擊行爲的發生（Crick & Werner, 1999）。由於本研究對於間接攻擊行爲反應的SIP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應評鑑」這個後端訊息處理步驟，因此以下僅針對此一SIP歷程作進一步的論述。一般而言，所謂「反應評鑑」乃指個體在社會情境之中會依據多項評鑑準則來衡量各種可能的行爲反應選項及其後果（Crick & Dodge, 1994; Fontaine, Burks, & Dodge, 2002）。在反應評鑑和決策的訊息處理步驟裡，兒童會從其記憶裡儲有高度可立即觸接且通路發達的行爲反應庫藏（behavior repertoires）挑選較能引發預期結果、較符合自己的信念系統（如：道德信念）、或合其心意的反應。凡是被個體預期能夠帶來個人內在、人際以及工具性等方面所期許的合意結果之行爲，即會受到正面的評價和青睞。當然，兒童也會考量自己對這些行爲的效能信念（efficacy beliefs），凡是個體持正面效能信念的行爲反應就比較容易被挑選（Crick & Dodge, 1994; Dodge & Schwartz, 1997）。最後被獲選的反應即會轉為動作或（和）言語行爲而表現於外。

過去的實徵研究已顯示同儕地位的個別差異可顯現在社會認知歷程之中。如：Dodge等人（2003）的縱貫研究發現兒童在早期若受同儕排斥，將可預測其往後的攻擊行爲發展，且社會訊息處理偏誤的型態可顯著解釋受同儕排斥的效果。Newcomb、Bukowski及Pattee（1993）的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研究也發現較受喜愛的「歡迎型」兒童除了在外顯行爲上呈現出較高的社會性、較少的攻擊行爲、具備較佳的社會問題解決技能、採取較為正向的社會行動，他們的認知能力也較好，且行爲反應庫藏主要是由成熟的社會技能所構成；相對的，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兒童除了在外顯行爲上較易出現攻擊行爲、較不具社會

性，且其社會認知能力也比一般兒童弱。因此，根據前述的理論觀點和實徵研究結果，本研究將針對「反應評鑑」變項進行測量，也預期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兒童以及高間接攻擊行爲傾向的兒童，一方面在其記憶中裝載著通路較為發達的間接攻擊反應大型目錄，另一方面對於各種間接攻擊行爲策略的評鑑和結果預期也有別於歡迎型或低間接攻擊行爲傾向的受試者。具體言之，本研究預期拒絕型兒童比歡迎型兒童更加偏好採取間接攻擊行爲策略來回應間接攻擊事件，而且高間接攻擊行爲傾向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策略的評鑑也異於低間接攻擊行爲傾向的兒童。然而，經前述有關性別與間接攻擊行爲關係的文獻回顧，本研究推測上述的主要效果可能會受限於性別因素的左右，而有交互作用產生。此交互作用之產生可以「效益風險率假說」解釋之。

（三）效益風險率假說

效益風險率假說（Björkqvist, Österman, et al., 1992; Prescott, 1996）主張，女生比男生花更多心思投資在社會地位和友誼關係的鞏固與維繫（Paquette & Underwood, 1999），關係議題對女生的重要性亦較高（Crick, 1995）。與男生相較之下，女生的友誼團體之社會結構比較小、往往為一對一之對偶關係、比較常有情感性的交流，且同儕團體彼此之間的界線較為清晰。換言之，女生的友誼關係較緊密，而且關係對她們而言不但較為重要，也是讓她們暢談感受和表達個人感覺的重要情境（Lagerspetz & Björkqvist, 1994; Prescott, 1996）。因此，女生友誼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特性即如同一把雙刃刀。亦即緊密友誼之中所培養的親密感與自我揭露一方面滿足了女生對於關係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要害之所在，因為在逐漸滋長的緊密友誼之中，透過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或散佈謠言來威脅、懲處或報復對方的間接攻擊方式可在關係發展的過程當中發揮作用並產生足夠的殺傷性。當然，亦有可能是因間接攻擊行爲本身具有兩項獨到之處，使得女生較為偏好採用這類的攻擊行爲：一為間接攻擊行爲比較隱晦、較不易被偵測、隱匿性較高，比較不是面對面的對抗，因而不但可以避免遭受對方立即的反撲，也可迴避社群內其他人對其攻擊行爲的譴責；此外，逞凶者不容易被逮到、受害者往往也無法立即找出真正的加害者。即使遭到指控，間接攻擊行爲的迂迴特性也讓加害者可以矢口否認自己傷人的動機，甚至四兩撥千金，輕而易舉替自己的行徑做出辯解（Björkqvist & Niemelä, 1992; Lagerspetz & Björkqvist, 1994; Pellegrini & Long, 2003; Richardson

& Green, 1999)，如此對於加害者本身的社會地位與同儕關係才不致於構成立即的威脅。二為此種可有效襲擊他人的方式並不需要仰賴強健的體魄，也不必訴諸於武力即可讓對方受創（Björkqvist & Niemelä, 1992），且其引發的苦楚往往並不亞於身體受創（MacDonald & Leary, 2005）；當然襲擊者或反擊者相對也就比較不必擔憂因自己的體力不足而使自我防衛或反擊行動受到限制。總之，以效益風險率來說，間接攻擊行為能夠提供給女生一種較為有效的手段造成對方的苦楚或博得控制（Crick, 1995）。

基於前述的「效益風險率假說」，本研究將特別針對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情緒反應進行性別差異上的檢定。首先，本研究預期，因為女生較男生更為關係取向，而使女生對關係操弄、社會排擠、散播謠言等間接攻擊行為的困擾程度會比男生來得更為強烈。過去的實徵研究（如：Björkqvist, Lagerspetz, et al., 1992; Crick & Grotpeter, 1995; Lagerspetz & Björkqvist, 1994）也已發現女生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困擾程度顯著大於男生，本研究將以訪談法再次檢驗以上的現象。此外，除了基於「效益風險率假說」，也基於過去研究指出男女生的社會化歷程不同，譬如：與男孩相較之下，父親和母親都傾向對女孩的難過情緒採取較為同理、鼓勵及獎賞的態度（Fivush, Brotman, Bucker, & Goodman, 2000; Garside & Klimes-Dougan, 2002, cited in Crick & Zahn-Waxler, 2003）。再加上，與女生相比，男生較易抑制和掩飾自己的難過感受（Crick & Zahn-Waxler, 2003），因此，本研究預期女生在遭遇間接攻擊事件時所產生的難過反應會比男生強烈。至於憤怒反應方面，則由於過去整合分析研究結果（如：Archer, 2004）已顯示人類對真實世界情境下的攻擊行為所引發的憤怒情緒沒有性別差異，且考量人類對於攻擊事件所引發的憤怒情緒反應有其演化上的適應價值及維繫生存的功能（Dodge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預期，男女生對間接攻擊此類的傷人行為會有相似的憤怒程度。此外，由於間接攻擊行為具有不易被逮到、隱匿性高，又可以達到痛宰對方的目的等優勢，使得具有不同社會適應類型的女生面臨攻擊事件時，都可能會在效益風險率的考量下認為間接攻擊策略是一種值得嘗試的同儕因應方式，致使女生在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的決策上，不因同儕地位或社會適應類型而有差異；然而，男生則因為在效益風險率的考量上與女生不同，以致並非所有的男生都認為間接攻擊行為策略是值得採用的衝突因應方式。基於以上之論述，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之性別與同儕地位具有交互作用亦為本研究將檢驗的其中一項重要假設。

（四）樣本選擇上的文化與發展考量

雖然效益風險率假說目前僅在西方國家的實徵研究當中獲得支持，但本研究認為此一假說亦可用於解釋身處「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Hwang, 2000）文化下的華人行為模式。理由是華人文化向來較為關係取向（Hwang, 2000），十分強調維繫社會和諧與平順的人際關係，成員對共享的社群全心投入，及避免外顯的人際衝突，因而往往期待人們在面對面的人際行為上要保持和諧（黃曬莉, 2005; French et al., 2002）。此外，華人社群也傾向認為魯莽的行為、咆哮或公開的衝突反映著個人內在強度（inner strength）的薄弱和素養的欠缺（French et al., 2002）。然而，華人社群對於人際和諧的要求往往僅限於外在行為的展現，並未對個人的內在情緒狀態加以同樣的約制。社群成員表面上雖然維持和諧，檯面下卻可能依舊處於暗藏不和的「虛性和諧」狀態之下（黃曬莉, 2005）。因此，在這樣的文化社群裡，像惡毒的閒話之類的間接攻擊行為乃成為社會控制的機制以及促進團體穩定的手段，且社群的成員也會害怕自己如果不加入此種行徑，可能會成為惡毒閒話的攻擊標靶，致使整個社群有時也刻意保有、維持了這樣的行為（French et al., 2002）；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所孕育的間接攻擊行為不但可能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而且社會也可能無形且間接地在催化這類攻擊行為的發展和演化。因此，目前雖甚少在華人文化中研究間接攻擊的性別差異或其背後的社會訊息處理歷程，但針對華人族群的探討應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將選定青少年前期這個發展階段進行研究。此為考量間接攻擊行為的兩項發展特性。一為兒童的間接攻擊行為巔峰期出現在兒童晚期或青少年前期（Archer & Coyne, 2005; Vaillancourt, 2005），大約是在11歲至15歲之間（Björkqvist, Österman, et al., 1992），尤其這個發展階段的女生在某些處境（如：爭奪共同喜好的特定異性對象）之下特別會採用這類低調的攻擊策略，而不選用肢體攻擊策略，以增加其生存適應力（Campbell, 1995）。因此，以這個發展階段的兒童為對象，研究間接攻擊行為的性別差異，將可避免基本率（base rate）過低的問題。二為比起其它類型的攻擊行為來說，間接攻擊須具備較佳的社會智力（social intelligence）、假設推理能力或涉及抽象思考與計畫之其它社會認知能力（Björkqvist, Österman, & Kaukiainen, 2000; Vaillancourt, 2005），而青少年前期剛好亦是兒童的認知發展從具體運思期轉換至形式運思期的階段，使得他們在運用間接攻擊的能力上不但較多樣化也較複雜。因此，以這個發展階

段的兒童爲受試者來研究間接攻擊行爲所涉及的社會認知與情緒反應上的個別差異，將可爲間接攻擊的發展歷程提供較爲豐富的訊息。最後，本系列研究的受試者年齡層雖然皆介於兒童後期與青少年前期之間，但爲行文方便，三個實驗中的受試者都將以「兒童」統稱之。

（五）研究方法上的改進

本研究之所以設計較爲耗時、耗力的標準化個別訪談法進行實驗，主要是因爲過去研究這類攻擊行爲的知名學者，如：Crick（2006）、Underwood及其同事（Galen & Underwood, 1997）都認爲間接攻擊行爲的相關測量不應侷限於量表施測方式，畢竟問卷施測的結果往往容易受到教師、父母、同儕以及兒童等填答者的個人知覺所影響，而信、效度良好的其它測量方式（如：訪談法或觀察法）則可避免以上的缺失。再者，集體施測往往較難控制資料蒐集過程的品質，例如，Crick與Werner（1998）以及Crain、Finch及Foster（2005）之所以皆無法發現同儕報告法所測得的間接攻擊行爲與反應評鑑之間的顯著關係，這些研究者都認爲與測量上無法擺脫社會期許有關，因此本研究將發展一套可減低社會期許因素干擾並提昇資料品質的個別訪談測量程序，藉此擴充當前測量間接攻擊行爲相關因素的研究策略。

總之，本研究將以青少年前期兒童爲研究對象，設計一套結構訪談程序，以呈現間接攻擊的假想故事後，受試者在間接攻擊卡片分類作業上的得分，做爲兒童及青少年對間接攻擊之反應評鑑的指標；並以受試者在聽到假想間接攻擊事件後的困擾程度、憤怒程度及難過程度做爲對情緒經驗的測量。本研究將收集這些數據以了解不同性別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經驗是否有所差異，以及不同社會計量地位與高低間接攻擊行爲傾向的兒童是否在反應評鑑這個社會認知歷程步驟上有所不同，藉此進一步釐清不同社會適應類型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的反應評鑑歷程之差異性，以瞭解華人兒童對此類攻擊行爲的一般看法和實際經驗。

最後，本系列研究也將測量受試者的語文智力。Newcomb等人（1993）的整合分析研究已指出社會計量地位與語文智力之間具有顯著相關，亦即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兒童的語文智商低於受同儕喜愛的歡迎型兒童。然而，Björkqvist、Lagerspetz等人（1992）、Björkqvist等人（2000）及Kaukiainen等人（1999）的研究發現高間接攻擊傾向者的社會智力和語文能力似乎較高，或至少不會比低間接攻擊傾向者來得低；畢

竟，採用間接攻擊方式，如：以編造不實故事散播謠言、說人壞話或挑撥離間，往往得具備某種程度的社會智力和語文能力（Sutton, Smith, & Swettenham, 1999b）。因此，雖然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於探討不同社會計量地位或不同間接攻擊傾向者的語文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但本系列研究因爲涉及以兩種不同的同儕地位指標（peer status index）（一種爲社會計量地位，另一種爲高低間接攻擊傾向）來進行區別預測（differential prediction），所以在訪談測量之後亦對受試者進行語文IQ測量，以確認本研究挑選的不同類型的同儕地位的受試者亦可反映出前述研究的結果。

研究一：前導研究

研究一以剛進入青少年前期之國小高年級兒童爲受試者，探討本研究所設計的這套訪談工具之效度，以確保此測量工具將來可適用於所有屬於青少年前期之受試者。研究一之具體目的有二。其一旨在測試與修改將於後續研究中使用的結構訪談之實驗材料及程序。其二則在透過檢驗該結構訪談程序能否有效區別教師主觀認定之歡迎型兒童和拒絕型兒童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差異，以及兒童在遭受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反應之性別差異，以初步建立此訪談程序之效度。同時亦將針對「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性別與同儕地位之交相互作用效果是否存在進行初步的檢驗。

研究一之所以特別以同儕地位中屬歡迎型和拒絕型的兒童進行比對，是因過去縱貫研究多已穩定發現兒童期的同儕地位是預測個體往後攻擊行爲的一項重要標記（marker）；尤其，受同儕排斥也往往被視爲個體往後是否發展出攻擊行爲之重要成因（Dodge et al., 2003）。因此，若本研究所設計的測量方法具有效度，理應可區辨這兩種兒童在社會訊息處理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將請受測班級之教師認定兒童的同儕地位，並預測拒絕型兒童比歡迎型兒童更容易選擇間接攻擊策略做爲因應同儕事件之手段。此外，根據效益風險率假說，本研究也預期對於間接攻擊事件，女生對此不但較易感到難過，亦會有較大的困擾；而根據Archer（2004）發現憤怒情緒不具性別差異，在本研究中也未設定憤怒情緒將發現性別差異。

（一）方法

1. 受試者

本研究以台北市兩所國民小學14個班級56名高年級學生爲研究對象。所有受試者皆由教師依其對班上學生人緣的主觀瞭解推薦而來；受推薦學生當中有

廿八位為教師評定為「較受同儕喜愛的歡迎型者」，另廿八位為「較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者」，且男女各半。凡受推薦之受試者皆經由教師口頭同意、家長書面同意，以及受試者口頭同意之後才正式邀請其參與為時約四十分鐘的個別訪談施測。受試者的年齡介於10.08歲至12.33歲 ($M = 11.60, SD = 0.55$)，他們在WISC-III中文版的詞彙測驗量尺分數介於5至16 ($M = 11.21, SD = 2.02$)。

2. 實驗材料

- (1) 間接攻擊事件新聞稿和錄音帶：呈現新聞稿之目的為使受試者在後續訪談中能輕易地將談話內容聚焦在間接攻擊事件的話題主軸，並藉此引發受試者對此類事件的觀點和感受。此外，本研究採用新聞稿格式，而非過去絕大多數研究慣用的短篇假想故事格式，是希望藉此營造出更貼近受試者生活經驗的逼真效果。本研究杜撰之「間接攻擊事件新聞稿」以受試者所熟悉的Yahoo電子網路新聞介面呈現，內文共574字。此新聞稿由一位男性播報員錄音，經Power Voice II軟體轉錄成Windows Media Player的聲音檔，播報時間為2分22秒。本研究之所以播放新聞事件的錄音，主要是考量過去整合分析 (de Castro, Veerman, Koops, Bosch, & Monshouwer, 2002) 發現以聽覺方式呈現刺激材料的實驗效果顯著比以文本、圖卡或影片等視覺呈現方式來得大。
- (2) 間接攻擊卡片分類作業：此作業主要用以測量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策略使用的偏好或認可。使用的施測工具包括分類符號卡三張，分別為「○」、「？」和「×」，這三張卡片的功能是讓受試者可將十五張「間接攻擊策略卡」一一分類至有效、無效及不確定等三堆；以及間接攻擊策略卡十五張，每張卡片皆為圖文並列的彩色卡片，且各卡片上面皆列有一種間接攻擊策略，這些間接攻擊策略皆取自Björkqvist、Lagerspetz等人 (1992)、Crick與Grotspeter (1995)，以及Galen與Underwood (1997) 這三組研究團隊過去的研究。
- (3) 情緒測量工具：本工具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用以測量受試者對本研究之假想新聞報導的受害事件，其整體和特定情緒的反應，包括困擾程度、憤怒程度和難過程度；受試者在零至十的刻度量尺上圈選數字；數字越高表示受試者對這類的事件越感困擾、憤怒或難過。第二部分則用以檢核受試者在訪談末了的情緒狀態，以了解受試者在訪談過程中的緊張/輕鬆程度以及正負向整體情緒，並藉此確認受試者最後是帶著愉快心情離開訪談情境。此部份的測量以溫度計 (刻度介於0至10之間) 圖示方

式呈現。

- (4) 語文IQ測量：有關語文IQ的測量，本研究採用WISC-III中文版 (陳榮華, 1997) 語文分量表中的詞彙分測驗的量尺分數取代原先該智力量表用五個分測驗所測得的語文IQ；之所以僅用該分測驗，不但是實務上縮減施測時間的考量之外，就方法和理論來說，陳心怡、陳榮華及朱建軍 (2001) 對台灣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一般能力指標」之常模建立與運用的研究也發現，常識、詞彙、類同和理解四個分測驗分數所形成的語文理解指數比語文IQ更是兒童語文能力的較佳代表。其中，又以詞彙分測驗為最廣泛用於研究時所用的分測驗；因此本研究以該分測驗的量尺分數做為受試者語文IQ的指標。

3. 實驗程序

受試者皆個別由施測者帶離教室接受標準化結構性的訪談。在進行訪談之前，施測者先自我介紹、問候受試者、與受試者閒談一兩個小話題並讓受試者熟悉當下的訪談情境，隨後向受試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徵求受試者的口頭同意，並請受試者承諾勿將待會兒訪談內容透露給班上任何其他同學，以免其他受試者在實驗前受到污染。

訪談一開始是先請受試者看一份「網路下載」的書面新聞報導，同時並請受試者戴上耳機聆聽該篇新聞報導的播報。此新聞報導之內容即有關校園內之間接攻擊事件。接著施測者以一系列問題詢問受試者個人直接遭受過或旁觀目擊到間接攻擊的經驗，以做為進入正式施測內容之暖身活動。包括「有沒有見過類似的人？」、「班上有沒有這樣的人？」、「這些人的姓名？(如果受試者願意回答的話)」、「他們都怎麼對待同學？」。接著請受試者以挑選迷宮圖中的特質形容詞的方式來描述具有如新聞稿所述之間接攻擊行為傾向者的特質，之後再請受試者回答是否有聽過本班、本校、其它班、或其它學校發生類似事件。以上之系列問題，著眼於受試者之個人直接受害或間接旁觀的經驗。接著詢問受試者對於新聞報導的加害者之行為意圖，然後引導受試者假想如果這類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是否會感覺不舒服、會不會有憤怒的情緒，並請受試者在情緒測量工具上表示假若該事件發生在其身上，其困擾、憤怒和難過的程度各會是多少。接著再詢問受試者對間接攻擊傾向者的喜愛度與其它觀感。

當受試者已被喚起對於間接攻擊的種種看法後，施測者將焦點拉至社會認知測量之主軸。施測者請受試者以自己或其他同學若遭遇類似新聞報導之同儕事件時要如何因應的角度，用「到底要如何才能給這種

人一點小小的教訓，又不會讓自己遭到對方的立即報復」的口氣詢問受試者；並鼓勵受試者盡其所能說出他想得到的各種可能辦法。爲了要讓受試者拋開社會期許，將其個人所想到的、但道德上卻未必被允許的種種間接攻擊方法都舉出，施測者再以：「還有什麼辦法是你以前曾經想過，但是卻沒有去做的，或者是後來你其實覺得自己不應該這麼做的，所以你就沒有那樣做的一些方法？」來詢問受試者。若超過三十秒後，受試者都未回答，則中止這部份的施測，以避免引起受試者的過度壓力或窘迫。以上這些問題的回答或反應，除了情緒測量之外，皆不納入本研究之分析，而是幫助受試者喚起自己過去的間接攻擊相關經驗，使受試者較爲輕易提取並觸接自己對間接攻擊的看法。

接著以「卡片分類作業」測量受試者對間接攻擊行爲之反應評鑑。施測者將十五張「間接攻擊策略卡」以隨機順序示予受試者，並要求受試者依照其個人覺得卡片上所列的方法「可以讓對方學到一點教訓，而且假若自己爲該事件的受害者，用了卡片上所列的方法來教訓對方，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好一些」的標準，將每一張卡片，依其有效與否而分到『○』（有效）、『？』（不確定）和『×』（無效）三堆之一。接下來，受試者需針對放在『？』（不確定）這疊的策略卡再判斷一次，但這次受試者僅能將這一堆的卡片重新歸類至『○』或『×』其中一堆。接著，受試者須從歸爲『○』的這一疊當中，挑選出他個人認爲最有效的一種方法，並盡量說出此策略會有效的各種原因。爲方便受試者做出判斷，施測者先請受試者從個人覺得最有效到最沒有效的順序由左到右先漸進排列出來，然後再判斷是否需要微調，最後指出他認爲最有效的那張策略卡。如果受試者沒有一張策略卡是歸爲『○』的話，那麼就問受試者：「剛才那些方法你都覺得沒有一個方法是有效的，那請你告訴我，你個人覺得除了那些方法之外，什麼方法才是比較有效的方法？」無論受試者有無回答、或他的回答是什麼，接下來施測者都請受試者從所有他認爲都沒有效的策略卡當中挑選出一種他認爲可能有效或比較有效的策略，但倘若受試者看完後，仍然覺得沒有一張卡片是有效的，施測者也就不再強迫受試者必須從中挑選一張。受試者最後挑選的「有效」卡片張數，即爲「反應評鑑」測量的結果依據。

上述的施測程序結束之後，施測者再邀請受試者思考他若是剛剛新聞報導中的受害者之朋友，他將如何幫助受害者解決這樣的間接攻擊事件。接著受試者立即接受情緒測量的操弄檢核，該情緒測量是以十點刻度的溫度計呈現，並請受試者針對三個題項，分別

爲「好—壞」、「難過—快樂」和「緊張—輕鬆」進行評定。本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受試者最後離開訪談教室時的整體心情是偏正向的（ $M = 8.03, SD = 1.76$ ）；此外，整體而言，受試者也表示訪談過程中自己的心情是偏向愉快的（ $M = 7.95, SD = 1.82$ ）與輕鬆的（ $M = 7.15, SD = 2.65$ ），而且這樣的心情並未隨著同儕地位 $F(3, 52) = 1.52, p = .22$ 與性別， $F(3, 52) = 1.91, p = .14$ 而有所差異。整個實驗訪談結束後立即對受試者進行語文IQ測量。最後施測者答謝受試者的參與，並將受試者護送回教室，結束整個施測活動。

（二）結果

爲確認研究一以教師提名法所挑選的「歡迎型」與「拒絕型」兒童的確與過去研究對此兩類同儕地位者的相關特質描述相符，本研究首先分析受試者的VIQ，結果發現歡迎型兒童的語文智商高於拒絕型兒童， $F(1, 54) = 4.19, MSe = 3.84,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7$ 。這顯示本研究所界定和區分的兩類同儕地位受試者之特性與過去研究相符。

接著，本研究以同儕地位及性別爲獨變項，以兒童之「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爲依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從表1結果可知，同儕地位之主要效果瀕臨顯著， $F(1, 52) = 3.66, MSe = 10.78, p = .06, \text{partial } \eta^2 = .07$ ，雖然教師眼中的歡迎型受試者與拒絕型受試者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測量未達.05統計水準的顯著差異，但是實際顯著性（practical significance）測量估計值（Cohen's $d = .51$ 或者 $\text{partial } \eta^2 = .07$ ）卻顯示同儕地位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間有中等程度的效果量存在。性別之主要效果， $F(1, 52) = 1.59, MSe = 10.78, p = .21, \text{partial } \eta^2 = .03$ ，以及性別和同儕地位之交互作用效果， $F(1, 52) = 0.04, MSe = 10.78, p = .84, \text{partial } \eta^2 = .001$ 則均未顯著。

接著，以兒童性別爲獨變項，並以遭受間接攻擊後的三種情緒反應（困擾程度、憤怒程度和難過程度）爲依變項進行MANOVA考驗。表2結果發現性別有顯著效果， $\text{Wilks' } \Lambda = .80, F(3, 52) = 4.28, p < .01, \text{partial } \eta^2 = .20$ 。後續分析顯示女生不但比男生對間接攻擊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 $F(1, 54) = 4.52, MSe = 5.13,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8$ ，對這類的事件的難過程度也比男生來得明顯， $F(1, 54) = 13.08, MSe = 6.50, p < .01, \text{partial } \eta^2 = .20$ ；至於生氣的反應，則無性別差異， $F(1, 54) = 0.74, MSe = 7.03, p = .40, \text{partial } \eta^2 = .01$ 。

爲進一步了解所有受試者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測量所用的十五種反應策略的分佈情形，表3呈現受試者認爲各間接攻擊策略之有效性的次數分配，

表1 不同性別與同儕地位之受試者的反應評鑑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一 (平均年齡：11.60歲)		研究二 (平均年齡：13.98歲)		研究三 (平均年齡：12.08歲)	
	同儕地位 (教師提名法)		同儕地位 (同儕提名法)		同儕地位 (同儕估計法)	
	拒絕型	歡迎型	拒絕型	歡迎型	高攻擊傾向	低攻擊傾向
男生	5.21 (2.83)	3.36 (3.39)	7.00 (4.71)	4.27 (2.40)	5.39 (3.17)	4.89 (2.99)
女生	6.14 (3.84)	4.64 (2.98)	3.53 (2.45)	4.40 (2.82)	4.39 (3.63)	4.22 (3.59)

註：標準差列於括弧內。

表2 不同性別之受試者對間接攻擊之情緒反應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情緒反應		
		困擾	難過	生氣
研究一	男	5.89 (2.66)	5.89 (2.95)	5.36 (2.73)
	女	7.18 (1.79)	8.36 (2.08)	5.96 (2.58)
研究二	男	6.27 (2.26)	6.17 (2.85)	6.57 (3.04)
	女	7.33 (1.88)	8.00 (2.36)	6.73 (2.96)
研究三	男	5.19 (2.39)	5.67 (2.86)	6.53 (2.61)
	女	6.58 (1.89)	7.89 (2.14)	6.39 (2.14)

註：標準差列於括弧內。

以及最青睞採用的間接攻擊行為反應之分配。由於56位受試者當中共有8位受試者完全未認可其中的任一種策略（亦即這些受試者選擇了0張），因此表3和表4所列的次數分配乃為剩下48位受試者的反應。這8位受試者當中，有7位是教師認定為歡迎型的兒童。從表3可知，本研究提供給受試者評鑑的每一種間接攻擊策略，都有人認為是有效的策略。此外，依據French等人（2002）之研究以及Underwood（2003）之理論模型再進一步將前述十五種間接攻擊行為策略歸類成「關係操弄」、「社會排擠」和「散播謠言」三類亞型。若以此亞型模式進行分析，則發現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受試者將與「關係操弄」有關的策略視為其最受青睞之策略（ $n = 28$ ），其次為「社會排擠」（ $n = 14$ ），最少人選用者為「散播謠言」（ $n = 6$ ）。若繼續針對最受青睞的策略進行分析，並比較歡迎型受試者與拒絕型受試者在這三類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之百分比是否同質，表4的結果顯示這兩類同儕地位的兒童選用

這三類間接攻擊策略的比例並無差異（ $\chi^2(2, N = 48) = 1.20, ns.$ ），亦即無論同儕地位為何，「關係操弄」皆為最多受試者選用的間接攻擊策略，「散播謠言」則為最少人選用的間接攻擊策略。

（三）討論

研究一旨在檢驗本研究設計的結構訪談材料與程序之可行性，同時探討這套程序能否有效區別教師認定之歡迎型和拒絕型兒童對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之差異，並檢驗間接攻擊行為事件的情緒反應之性別差異。結果顯示：歡迎型與拒絕型的受試者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測量雖然未達.05水準的顯著差異，但瀕臨顯著水準，且不同同儕地位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間有著中等程度的效果量存在。倘若後續的研究能採用較大的樣本數，則或可發現兩變項之間具顯著關聯性；畢竟，顯著水準乃為效果量與樣本數的乘積

表3 受試者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測量所用的十五種反應策略之分佈

類型 ^a	項目	挑選次數	最受青睞
1	馬上跟他斷絕往來，再去認識、結交別的朋友，讓他少個朋友	24	12
2	故意不讓他加入我們的團體；分組的時候，就故意表示不願意跟他同一組	27	9
1	故意疏離他，如果他要找我，我就故意不理他、裝作沒聽見或沒興趣、冷淡的對待他	30	7
1	碰到他，就趁他還在附近，故意跟旁邊的人小聲的說：『走!我們不要跟那種人在一起。』	29	5
3	把他個人的秘密或隱私偷偷說給第三者知道，並以這種方式來對付他	11	5
2	找機會故意私底下傳紙條給他，並在紙條上面寫：「沒有人會想跟你當朋友！」這類的話	21	3
1	想辦法影響其他同學去討厭那個可惡的人	21	2
1	找機會暗中騷擾、擾亂他、給他一些小麻煩	12	1
1	趁機會私下恐嚇他：「除非你照我跟你說的那樣去做，不然我就不跟你好！」	4	1
2	想辦法讓他沒辦法參加我們私下辦的活動；如果他要參加，就故意為難他	18	1
2	如果碰到他，就趁其他人沒看到時，瞪他一眼或擺個臭臉給他看，裝出一副很不屑他的樣子，然後就掉頭離開	15	1
3	找機會在背地裡批評他的長相、體型、髮型、穿著或裝扮	13	1
3	找機會，在那個人的背後說一些對他不利的壞話	14	0
3	找機會編造一些對他不利的謊言或不真實的故事，然後把這些造假的事說給其他人聽，讓他的名譽受損	8	0
3	找機會在小紙條上寫一些批評他的話，然後私底下傳這些紙條給一些人看	7	0

^a類型「1」為「操弄關係」；類型「2」為「社會排擠」；類型「3」為「散播謠言」。

(Rosenthal & Rosnow, 1991)。

如同過去有關肢體攻擊的研究，本研究發現受同儕排斥的拒絕型兒童與受同儕喜愛的歡迎型兒童對於同儕互動事件的訊息處理存在著個別差異。這樣的個別差異雖或有可能來自既存的社會技巧缺陷 (Sutton, Smith, & Swettenham, 1999a)，也有可能是兒童過去獨特的經驗累積所致。比如，若個體過去長期飽受同儕以間接攻擊手段加以對待，而充分體驗此類攻擊行為所造成的苦痛滋味和殺傷性；抑或個體過去長期或反覆使用暗中傷人的手段，不但獲得了給對方顏色瞧瞧的實質效益，還免除了立即受到對方報復或還擊的威脅和衝擊，那麼吾人可以推論，當個體受到挑釁、威脅或傷害時，長期記憶所裝載的這些間接攻擊行為策略的建構即可輕易打通，並且活絡起來，進而使得個體在揀選並決定可行的反應時更加青睞某些特別能夠發揮作用的間接攻擊策略。這或許是為何研究一發現拒絕型兒童較為偏好採用間接攻擊行為策略來反擊間接攻擊者的傷人行為。

此外，研究一也發現性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各種不同情緒反應的效果；尤其，女生對間接攻擊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這樣的結果不但複製了Crick、Grotpeter及Bigbee (2002)、Galen與Underwood (1997)的研究發現，以及Crick與Zahn-Waxler (2003)的理論觀點，也似乎暗示著女生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敏感度較高。此外，女生對這類攻擊事件的難過程度遠超過男生。這樣的結果也複製了Björkqvist、Lagerspetz等人 (1992)、Crick與Grotpeter (1995)，以及Lagerspetz與Björkqvist (1994)等人過去以問卷法進行研究所得的發現，再次支持間接攻擊行為似乎在女生的同儕團體中特別能夠發揮作用的說法 (如：Björkqvist, Lagerspetz, et al., 1992; Lagerspetz & Björkqvist, 1994)，亦即支持了效益風險率假說中對於男女使用間接攻擊具差異性的解釋。至於男女生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生氣反應則無性別差異；此結果與Archer (2004)針對人類對於真實生活世界中攻擊行為的憤怒反應的性別差異之整合分

表4 兩類同儕地位受試者最為青睞的間接攻擊類型之人數分配

		評鑑類型		
		關係操弄	社會排擠	散播謠言
同儕 地位	人數	16	6	4
	拒絕型			
	期望次數	15.2	7.6	3.3
	百分比	61.5%	23.1%	15.4%
	人數	12	8	2
	歡迎型			
	期望次數	12.8	6.4	2.8
	百分比	54.5%	36.4%	9.1%

析結果一致。

由於研究一提供給受試者評鑑的每一種間接攻擊策略，都有人挑選並認為有效；因此，後續研究中仍將沿用這十五種策略供受試者評鑑。此外，本研究發現同儕地位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間有著中等程度的效果量存在；因此，在後續研究中仍將沿用這套訪談程序來測量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策略的評鑑，但將增加樣本數，以提高研究結果的統計考驗力（power）。此外，為了充分活絡受試者既有的間接攻擊之反應目錄，其後的研究中，於進行卡片分類作業之前，將再增加有關於間接攻擊行為的性別觀、發展觀、事件攻擊者的意圖歸因、對此類事件的反芻情況等問題；而在卡片分類作業之後，為了稀釋受試者對於此類攻擊事件報導的負面感受，也將透過回想正向同儕事件的作業，提高受試者以正向情緒離開訪談情境的機率。此外，為了讓受試者的同儕地位認定過程更符合生態效度，研究二也將改以同儕提名法（peer nomination technique），而非教師個人主觀提名方式找出「歡迎型」與「拒絕型」這兩類同儕地位的受試者。總之，本前導研究以即將或剛進入青少年前期的兒童為受試者，初步檢驗了本訪談程序之效度，後續的研究將繼續改善各種程序上的可能缺失、考量同儕地位認定過程的生態效度，並針對已正式進入青少年前期的受試者進行測量，以進一步瞭解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與情緒反應。

研究二：社會計量地位

在初步檢驗了間接攻擊訪談工具之效度後，研究二將改良該工具中的缺失，並針對正式進入青少年前期的受試者，再次檢驗他們對間接攻擊的反應。此外，「歡迎型」與「拒絕型」同儕地位的認定方式，

也由教師主觀認定改由同儕提名程序來決定，以增加生態效度，並以此設計再次檢驗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歷程之組間差異；同時也比較不同性別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反應。此外，本研究也將基於效益風險率假說，檢驗性別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關係是否受到社會計量地位所調節。

根據先前的文獻探討以及前導研究之結果，本研究預期女生比男生較易因間接攻擊而感到困擾、難過，但憤怒的情緒則無性別差異。根據社會訊息處理模式，本研究預測被同儕提名為「拒絕型」的兒童比「歡迎型」的兒童更容易以間接攻擊的因應方式面對間接攻擊事件。最後，雖然研究一的初步分析並未發現「間接攻擊反應評鑑」具有性別與同儕地位之交互作用效果，但對於研究二中已正式進入青少年前期的受試者，仍將依據效益風險率假說預期性別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關係會隨著不同的社會計量地位而有差異。

（一）方法

1. 受試者

研究二在全省九所國民中學15個班級中先經由同儕提名程序找出各班中之歡迎型與拒絕型之男女生，再由這兩種同儕地位的男生和女生樣本群當中各自隨機抽出共60名國二學生參與本實驗，其中包括三十位「歡迎型」，三十位「拒絕型」，且男女各半。兩種同儕地位的分類標準乃根據Coie與Dodge（1988）以及洪儷瑜與涂春仁（1996）進行。受試者的年齡介於13.50歲至14.67歲（ $M = 13.98$, $SD = 0.30$ ），他們在WISC-III中文版的詞彙測驗量尺分數介於3至13（ $M = 9.22$, $SD = 2.29$ ）。所有參與者皆經教師口頭同意、家長書面同意，以及其本人口頭同意之後才被正式邀請參與為時約四十分鐘的訪談施測。

2. 實驗程序

受試者皆個別接受同研究一的標準化結構訪談，但另增加有關間接攻擊事件之經驗知覺（性別觀、發展觀、意圖歸因、是否容易於事件發生後再度回想這類事件、是否願意在事件發生後和這類攻擊者和好）的問題，以及正向同儕事件的回想作業，其餘的訪談內容大致和研究一雷同。

3. 實驗材料

研究二之「間接攻擊事件新聞稿和錄音帶」及各項測量皆與研究一相同。

（二）結果

為確認研究二所界定的兩類同儕地位與過去研究對此兩類兒童的相關特質描述相符，本研究首先針對不同社會計量地位受試者的VIQ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社會計量地位具有顯著效果， $F(1, 58) = 6.40$, $MSe = 4.82$, $p = .01$, $\text{partial } \eta^2 = .10$ 。具體言之，歡迎型（ $M = 9.93$, $SD = 1.84$ ）比拒絕型的受試者（ $M = 8.50$, $SD = 2.50$ ）呈現較高的語文智商能力。這顯示研究二的兩類受試者的確與過去研究對於這兩類兒童所描述的特質相符。以下則將針對研究二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進行結果分析。

首先，本研究以性別和社會計量地位為獨變項，並以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之主要效果顯著， $F(1, 56) = 3.98$, $MSe = 10.47$,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7$ ；比起女生（ $M = 3.97$, $SD = 2.63$ ），男生（ $M = 5.63$, $SD = 3.93$ ）較青睞以間接攻擊行為策略教訓攻擊者。社會計量地位之主要效果不顯著， $F(1, 56) = 1.25$, $MSe = 10.47$, $p = .27$, $\text{partial } \eta^2 = .02$ 。此外，性別和社會計量地位的交互作用顯著， $F(1, 56) = 4.64$, $MSe = 10.47$,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8$ ；顯示前述之主要效果的解釋須受限於此一顯著的交互作用效果。進行簡單主要效果考驗發現，就拒絕型的受試者而言，男生（ $M = 7.0$, $SD = 4.71$ ）相對而言比女生（ $M = 3.53$, $SD = 2.45$ ）更加青睞以間接攻擊策略來教訓間接攻擊者， $F(1, 56) = 5.35$, $MSe = 10.47$, $p < .01$ ；就歡迎型的受試者而言，女生（ $M = 4.40$, $SD = 2.82$ ）和男生（ $M = 4.27$, $SD = 2.40$ ）對於以間接攻擊策略來教訓間接攻擊者的青睞程度則無顯著差異， $F(1, 56) = 0.01$, $MSe = 10.47$, $p = .91$ 。此外，拒絕型男生對於以間接攻擊策略來教訓間接攻擊者的青睞程度相對顯著高於歡迎型男生， $F(1, 56) = 5.35$, $MSe = 10.47$, $p < .05$ ；但拒絕型女生和歡迎型女生對於以間接攻擊策略來教訓間接攻擊者的青睞程度

則無顯著差異， $F(1, 56) = 0.54$, $MSe = 10.47$, $p = .47$ 。

其次，以MANOVA考驗性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三種不同情緒反應的效果，結果發現性別具有顯著效果， $\text{Wilks' } \Lambda = .86$, $F(3, 56) = 2.99$,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14$ 。後續分析發現，與男生（ $M = 6.27$, $SD = 2.26$ ）相較之下，女生（ $M = 7.33$, $SD = 1.88$ ）對於間接攻擊的受害事件會有較大的困擾感受， $F(1, 58) = 3.95$, $MSe = 4.32$,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6$ 。女生（ $M = 8.0$, $SD = 2.36$ ）對於這類事件的難過程度也比男生（ $M = 6.17$, $SD = 2.85$ ）明顯， $F(1, 58) = 7.34$, $MSe = 6.87$, $p < .01$, $\text{partial } \eta^2 = .11$ 。至於生氣的反應，則無性別（男生： $M = 6.57$, $SD = 3.04$ ；女生： $M = 6.73$, $SD = 2.96$ ）差異， $F(1, 58) = 0.05$, $MSe = 8.99$, $p = .83$, $\text{partial } \eta^2 = .001$ 。

（三）討論

研究二旨在了解不同性別與社會計量地位的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以及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反應。首先，本研究發現：拒絕型的男生比拒絕型的女生更加青睞以間接攻擊行動策略來回應間接攻擊行動，但就歡迎型而言，男女生對於以間接攻擊行動策略來回應間接攻擊的青睞程度無顯著差異。此外，拒絕型比歡迎型的男生更青睞使用間接攻擊策略；拒絕型和歡迎型的女生則無差異。此一結果初步提供證據支持青少年前期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會受到社會計量地位所調節。

此外，如同研究一的結果，本研究再度發現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各種不同情緒反應具有顯著差異，女生傾向對間接攻擊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與難過。然而，男女生的生氣強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與研究一的結果一致，再度支持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可能因其對間接攻擊的效益風險評估不同而使其在遭遇間接攻擊時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強度。

研究一與研究二對於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在社會計量地位的主要效果，以及性別與社會計量地位交互作用的效果之發現頗為不同。研究一發現社會計量地位的主要效果瀕臨顯著水準，且具有中等程度的效果量，但研究二發現社會計量地位主要效果未達.05統計顯著水準，且效果量小。本研究推測這可能與統計考驗力有關，因而本研究曾嘗試將研究一和研究二的樣本合併成一個較大的樣本，如此則發現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在社會計量地位上具有顯著效果， $F(1, 114) = 4.39$, $MSe = 11.04$, $p < .05$, $\text{partial } \eta^2 = .04$ 。此一分析結果似乎可反映研究的樣本人數的確與社會計量

地位之主要效果是否會顯著有所關聯。

此外，研究一の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之性別與同儕地位交互作用效果未顯著，但本研究二卻發現此交互作用效果顯著。除了前述討論的統計考驗力或樣本人數的因素之外，亦可能與這兩個研究的受試者年齡不同有關。研究一受試者的年齡介於10.08歲至12.33歲，但研究二受試者的年齡介於13.50歲至14.67歲。兩個研究受試者的年齡層顯然不同。由於青少年前期乃為個體在生理成熟以及認知能力（從具體運思轉換至形式運思）皆有明顯轉變的發展階段，因此，可能些微的年齡差異即可呈現出性別與同儕地位在社會認知反應上的不同作用方式。此外，這兩個年齡層的研究結果，也反映出本研究發展的訪談工具對年齡較大的兒童似乎有更好的區辨力。

以上兩個研究分別以不同的年齡層顯現同儕地位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間在青少年前期的關聯性，如此逐步建立了本系列研究所欲發展的結構訪談測量程序之效度。然而，此測量程序之目標既然為反映青少年前期兒童之間接攻擊反應評鑑，則其應可區辨高間接攻擊傾向與低間接攻擊傾向之兒童對於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差異。因此，後續的研究三將直接從實際同儕生活中具不同程度間接攻擊傾向之受試者當中，藉由具備良好信、效度的同儕估計法（peer estimation technique）（Björkqvist, Lagerspetz, et al., 1992; Prescott, 1996），找出「高間接攻擊傾向」與「低間接攻擊傾向」的兒童進行比較。

總結來說，為進一步確認間接攻擊訪談程序的效度，後續的研究將有如下的幾項調整：一為再增多樣本人數，以提高統計考驗力；二為以同儕估計法測得之間接攻擊傾向做為同儕地位的指標；三為為了進一步確認這套訪談工具在青少年前期之較小年齡層中是否仍具適用性，而再度以類似研究一的受試兒童之年齡層為施測對象，以瞭解這套訪談工具除了能區分不同社會計量地位的兒童之外，也可區辨剛邁入青少年前期之兒童的不同間接攻擊傾向。研究三之所以仍維持僅測量單一年齡層，而不是將不同年齡層納入成為實驗設計中的一個變項，是因為如此將使原本的二因子受試者間設計變成三因子受試者間設計，而本研究所採用的個別訪談實驗程序頗為耗時，若再採用三因子受試者間設計，則所需耗費的樣本人數勢必加倍。在統計考驗力、實驗的時間及人力的耗費等因素的綜合權衡之下，因此研究三仍將維持二因子之設計。

研究三：間接攻擊傾向

研究三之目的有二。其一為檢驗分別具有高、低

間接攻擊傾向的兩類青少年前期兒童在「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組間差異，並了解性別與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關係是否因間接攻擊傾向而有所變化。其二為比較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前期兒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反應，以再次檢驗研究一與研究二的結果。

（一）方法

1. 受試者

研究三在全省九所國民小學18個小六班級中先進行一項同儕估計程序，依此認定其中具有高、低間接攻擊行為傾向的男生和女生共72位。研究三採用共軛設計，按照同校、同班且同性別的方式，以十五題的同儕估計間接攻擊之測量結果，選出各受測班級中被同儕認為最有間接攻擊行為傾向的男女生各一名，並以一位被同儕認為是沒有間接攻擊行為傾向之同性別的同班同學與之配對。所謂最具間接攻擊傾向者係指間接攻擊標準化總分在該班同性別當中最者，與之配對的受試者則為間接攻擊標準化總分最低者。凡被選出來之參與者皆經由家長書面同意之後才正式邀請其參與為時約四十分鐘的訪談施測。但其中有四位家長不同意其子女參加研究，因此再從該班同性別間接攻擊標準化總分最高或最低的25%者當中隨機選出遞補人選。最後，正式參與本研究的高間接攻擊傾向者經由同儕估計法測得之間接攻擊行為頻率之z分數皆大於0.5，而低間接攻擊傾向者之z分數皆小於-0.5。受試者的年齡介於11.42歲至14.42歲（ $M = 12.08$, $SD = 0.42$ ），他們在WISC-III中文版的詞彙測驗量尺分數介於5至14（ $M = 10.82$, $SD = 1.92$ ）。

2. 實驗程序

受試者皆個別接受標準化結構訪談，訪談程序同研究二。

3. 實驗材料

研究三使用的實驗材料同研究一、二。

（二）結果

本研究首先針對兩類同儕地位受試者的VIQ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兩者語文智商無顯著差異， $F(1, 70) = 0.09$, $MSe = 3.75$, $p = .76$ 。具體言之，高間接攻擊傾向者（ $M = 10.89$, $SD = 1.75$ ）和低間接攻擊傾向者（ $M = 10.75$, $SD = 2.10$ ）的語文能力相似。這顯示研究三的兩類受試者之認知能力差異與Sutton等人（1999a, 1999b）的觀點相符。

接著以性別和間接攻擊傾向高低為獨變項，並以間接攻擊行爲反應評鑑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表1為受試者對間接攻擊行爲持正向反應評鑑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性別之主要效果不顯著， $F(1, 68) = 1.11$, $MSe = 11.26$, $p = .30$ 。間接攻擊傾向之主要效果不顯著， $F(1, 68) = 0.18$, $MSe = 11.26$, $p = .68$ 。性別和間接攻擊傾向之交互作用效果亦不顯著， $F(1, 68) = 0.04$, $MSe = 11.26$, $p = .83$ 。

以MANOVA考驗性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各種不同情緒反應的效果，結果發現性別具有顯著效果， $Wilks' \Lambda = .795$, $F(3, 68) = 5.86$, $p < .01$, $partial \eta^2 = .205$ 。後續分析顯示，相較於男生 ($M = 5.19$, $SD = 2.39$)，女生 ($M = 6.58$, $SD = 1.89$) 不但對間接攻擊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 $F(1, 70) = 7.49$, $MSe = 4.63$, $p < .01$, $partial \eta^2 = .10$ ；女生 ($M = 7.89$, $SD = 2.14$) 在遭遇間接攻擊受害時的難過程度也遠比男生 ($M = 5.67$, $SD = 2.86$) 明顯， $F(1, 70) = 13.97$, $MSe = 6.37$, $p < .001$, $partial \eta^2 = .17$ 。至於生氣的反應，則無性別 (男生： $M = 6.53$, $SD = 2.61$ ；女生： $M = 6.39$, $SD = 2.14$) 差異， $F(1, 70) = 0.06$, $MSe = 5.71$, $p = .81$ 。

(三) 討論

研究三旨在了解不同性別與間接攻擊傾向的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的反應評鑑，以及不同性別的受試者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情緒反應。結果發現：不論性別、間接攻擊傾向、或兩者的交互作用在間接攻擊行爲的反應評鑑上均無顯著差異。此結果與研究一或研究二以教師提名或同儕提名所得之社會計量地位的結果、或是與由SIP理論所形成的假設均不符。根據SIP理論的推導，高間接攻擊傾向者在反應評鑑步驟中應會較青睞間接攻擊行爲策略，因而在後續的行爲展現步驟會有較多的間接攻擊行爲。然而Crick與Dodge (1994) 的SIP理論亦認為，社會線索編碼、解釋、目標澄清、反應觸接與反應評鑑等各動態的社會訊息處理步驟是以平行方式運作著，也與記憶儲存、社會基模表徵等既存的資料庫之間有著回饋迴路和交互循環的動態歷程。因此，研究三之結果可能反映的是SIP其它子歷程與反應評鑑歷程之間的複雜關係，需要後續更精緻的研究設計才有可能釐清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作用方式。除此之外，若能同時將間接攻擊行爲的發展觀點及效益風險率假說一併納入思考，或許本研究的結果就不致於那麼令人訝異。以下的討論就是從這樣的想法衍生而出。

研究二發現間接攻擊行爲策略的反應評鑑具有性別主要效果以及性別與同儕地位之交互作用效果，但

研究三使用了比研究二更多的樣本人數卻得不到這樣的顯著效果。發展因素 (如：年齡) 或可用以解釋兩者的矛盾。女生在生命發展的早期即已習得任何形式的攻擊行爲 (包括間接攻擊行爲) 都是令人討厭、會受他人所不喜歡，且不為人所接受的行爲 (Bandura, 1965; Huesmann, Guerra, Zelli, & Miller, 1992, cited in Fontaine, Burks, & Dodge, 2002)，所以步入青少年前期的女性受試者 (如本系列研究中的女生) 可能因此削弱或抑制了將間接攻擊行爲評為有效策略的意願。即便女生基於效益風險評估的考量，較偏好使用間接攻擊策略，而非直接攻擊行爲策略，但若有適切的利他 (prosocial) 行爲策略可茲選用，這個階段的女生勢必仍將更偏好採取最低風險、最高效益的利社會行爲策略。另一方面，男生在成長過程中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的直接經驗相對較少，且由於其認知與語言發展在兒童早期較女生緩慢，故在兒童期對於這類攻擊的傷害忍受閾限較高，甚至認為間接攻擊行爲所造成的傷害無關痛癢。

本研究三與研究一皆以剛剛進入青少年期的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且皆無法發現間接攻擊行爲反應評鑑之性別主要效果或性別與同儕地位 (無論是同儕提名法或以同儕估計法所取得的人緣或攻擊傾向指標) 之交互作用效果，但研究二以年齡稍大的國中生為研究對象卻發現性別之主要效果，以及性別與社會計量地位之交互作用效果皆顯著。不但女生比男生更偏好間接攻擊的傾向已經消失，而且這些已經正式進入青少年前期的男生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的相關經驗累積量，可能已到達能夠感受此類攻擊行爲的傷害性和有效性，甚至比女生更願意表現出對這類攻擊行爲的青睞。本系列三個研究不一致的發現，似乎暗示年齡可能是調節間接攻擊行爲反應評鑑的重要變項。如同研究二的討論，青少年前期這個短短的兩三年之間，個體可能因其生理成熟以及認知能力等狀態皆有明顯轉變，以致即便同屬青少年前期階段的不同年齡層兒童即有顯著不同的社會認知反應，使僅有些微不同的年齡層之受試者在本系列研究中呈現完全不同的社會認知光譜。此發展意涵仍待往後研究確認。

此外，如同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結果，研究三又再度發現不同性別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各種不同情緒反應具有顯著差異，女生不但傾向對間接攻擊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如果當這類攻擊事件發生在她們身上，她們也較容易感到難過。然而，對於間接攻擊事件的發生，男女生皆會出現生氣的情緒反應，但兩者生氣的強度無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在三個研究中十分一致，顯示「效益風險率假說」似乎可以反映並解釋不同性別的兒童對於間接攻擊事件所造成的傷害

會有不同情緒反應之現象。不過由於男女生不論在友誼品質或同儕團體結構的親密性等面向上都有差異，所以到底是性別本身、抑或不同性別之同儕關係特性而引發情緒的性別差異，卻仍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綜合討論

本系列研究旨在發展一套有別於問卷形式的訪談測量程序以探討青少年前期兒童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的特定社會認知與情緒經驗，並藉此檢驗該訪談測量的效度。主要結果可分為情緒反應及間接攻擊反應評鑑兩部分。

在情緒反應的分析中，無論是研究一、研究二及研究三皆穩定發現青少年前期的女生不但傾向對間接攻擊的受害事件感到較大的困擾，也較容易在遭遇同儕間接攻擊之後感到難過。此結果與過去對男女生的情緒社會化歷程的研究結果（見Crick & Zahn-Waxler, 2003）相符。此外，本系列研究之結果不但與過去西方文化下以問卷調查的實徵研究發現（如：Björkqvist, Lagerspetz, et al., 1992、Crick & Grotpeter, 1995、Crick et al., 2002及Lagerspetz & Björkqvist, 1994）一致，也以結構訪談法首度在華人文化下初步支持了間接攻擊行為的「效益風險率假說」。這顯示效益風險率假說不僅適用於西方文化，似乎也適用於解釋華人文化下不同性別的兒童面對間接攻擊受害時的情緒反應。事實上，無論是從演化的觀點（Campbell, 1995, 1999）或者從發展的觀點（Björkqvist, Lagerspetz, et al., 1992; Björkqvist, Österman, et al., 1992）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發展之詮釋，皆以「效益風險率假說」為其論述的基調。過去在多個文化下所進行的研究結果也已顯示，不管所屬的文化背景為何，如：芬蘭、波蘭、義大利、美國、以色列、澳洲、阿根廷、印尼等國，女性皆偏好使用較為隱晦以及具有社會操弄性質的間接攻擊策略勝於直接攻擊策略，且對這類的攻擊行為較易感到困擾（Vaillancourt, 2005）。這也難怪會有學者（如：Campbell, 1995, 1999; Vaillancourt, 2005）因而主張間接攻擊行為乃為經由演化後普遍存在的適應結果。

至於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間接攻擊反應評鑑」之性別與同儕地位之主要效果及交互作用效果並不穩定。比如研究二發現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具有顯著的性別與同儕地位（拒絕型相對於歡迎型）交互作用效果，但是研究三卻未發現性別與同儕地位（高間接攻擊傾向者相對於低間接攻擊傾向者）之交互作用效果。除了稍早在研究二與研究三的討論中曾針對年齡可能扮演的調節角色進行討論之外，另一值得思索的問題則為是否「拒絕型或歡

迎型」與「高間接攻擊傾向或低間接攻擊傾向」這兩類同儕地位指標具有截然不同的涵義？

從過去有關不同同儕地位兒童的認知能力之研究發現可知，拒絕型兒童的社會認知能力、語文技能或社會技能都較歡迎型兒童來得差，他們的社會適應能力不外乎涉及認知缺陷或認知偏誤的問題，所以較偏好選擇以攻擊行為因應同儕間的衝突事件。相反的，與低間接攻擊傾向者相較，高間接攻擊傾向者往往有較佳的語文技能和社會智力（Björkqvist et al., 2000; Kaukiainen et al., 1999）、具備良好的社會認知能力和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技能（Sutton et al., 1999a），才能靠操弄社會關係、動員組織他人等不易被偵測到的間接攻擊行為方式來傷害特定對象。在本系列研究中，研究一和研究二皆穩定測得拒絕型兒童的語文智力顯著低於歡迎型，而研究三卻發現高、低間接攻擊傾向者的語文智商差異不顯著。或許這正可說明本研究使用不同的同儕地位指標，會得出不同的結果的可能原因之一。

本研究針對間接攻擊行為反應評鑑所形成的假設是依據Dodge的SIP理論推導而來，因而亦以SIP理論中對於高攻擊傾向者之描述而預期高間接攻擊傾向者對於間接攻擊行為策略的肯定或正面反應評價應顯著高於低間接攻擊傾向者，但本研究結果卻不支持這樣的假設。過去研究也曾發現高、低間接攻擊傾向兒童之間接攻擊反應評鑑沒有差異。例如，Crick與Werner（1998）以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兒童為受試者，發現無論男女，具有間接攻擊傾向的兒童在遭遇間接攻擊的同儕衝突情境時並未展現偏誤的反應評鑑與決策型態。近期Crain等人（2005）的兩個研究結果也跟研究三的結果雷同，他們發現同儕報告法所測得的間接攻擊行為與反應評鑑這個社會訊息處理變項無關，甚至也與其它社會訊息處理變項（包括：意圖歸因、社會目標、結果預期、反應決策）皆無關。

然而以上兩個西方的研究之所以結果不顯著，可能都與其測量上無法擺脫社會期許因素的干擾有關，因為這些研究除了皆為集體施測，且皆以直接詢問受試者各種間接攻擊的方法是否是個「好」方法來進行測量，但本研究在請受試者評估間接攻擊行為時，不但避免向受試者提及「好、壞」或「對、不對」等道德評價性的字眼，而以「可否讓對方學到一點教訓，並且讓自己心情好一點」的問法來引導受試者以自己的主觀想法對卡片上所列的攻擊行為策略進行評鑑，同時施測指導語也以告訴受試者「不必考慮太多，也不要想太久，憑你個人的感覺和看法來判斷就可以了」的方式，來鼓勵受試者迅速以自己的第一直覺反應作為選擇的依據。此外，在擇選卡片的過程中，受

試者也不必第一次就得決定需把行爲題項卡歸類至「有效」（放在「○」的標記下）或「無效」（放在「×」的標記下）這兩類之中，而可以先把卡片留置在「尚無法決定」（放在「？」的標記下）做爲緩衝，免除受試者因被迫只能在「○」或「×」兩者立即做抉擇，而無形中又得考慮過多、過久並滾進社會期許因素的干擾。

經由前述施測方式的設計並執行了以上種種避免或減低社會期許因素可能造成干擾的措施之後，本研究之結果仍與Crick與Werner（1998）以及Crain等人（2005）雷同。雖然本研究、Crick與Werner（1998）以及Crain等人（2005）等這三個研究皆以SIP模式爲基礎，也皆無法發現高低間接攻擊傾向的同儕地位指標與反應評鑑之間的顯著關係，而Crick與Werner（1998）以及Crain等人（2005）都因而推測：可用以解釋直接攻擊行爲的SIP模式未必適用於解釋間接攻擊行爲，尤其，Crain等人（2005）更是強烈懷疑SIP模式用以解釋間接攻擊行爲的適用性，但本研究依據研究二所發現的交互作用效果，並考量本系列三個研究的受試者年齡差異，還是主張SIP模式未必不適用，但應在運用此理論模式解釋間接攻擊傾向之個別差異時，將發展因素納入考量。亦即在青少年前期的兒童，由於他們的社會經驗與認知能力的快速累積與增長，可能正是處於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看法的轉型階段，一旦施測對象的年齡層稍有差異，便造成不一致的研究結果。

本研究雖已透過結構訪談並逐步調整施測指導語等方法提高測量工具的敏感度，使測量工具足以敏銳地偵測到不同同儕地位之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差異性，但本研究所設計的訪談程序及「反應評鑑」的測量方法確實仍有改進之空間，例如：在這三個研究中，受試者皆僅對各間接攻擊行爲策略進行「是」與「否」之有效性評鑑，並未針對其效力之大小進行評估，又例如這三個研究中提供給受試者進行評鑑的行爲反應僅限定於間接攻擊行爲，卻未將其它種類之攻擊行爲或利他行爲亦放入評鑑的選項中。往後研究若能將前述兩項測量上的改進策略納入考量，或許可提高個別差異的偵測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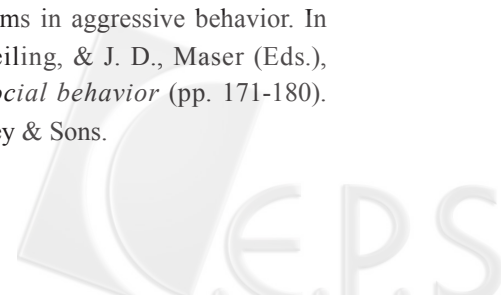
最後，本研究尚有下列兩項限制：第一，SIP理論主張各訊息步驟之間是以平行處理且交互影響的方式運作著（Crick & Dodge, 1994）；因此，若僅單獨探討反應評鑑歷程與間接攻擊行爲之間的關係，卻忽略其它訊息處理步驟對於個體在面對間接攻擊行爲的反應評鑑或決策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無法釐清個體對於間接攻擊行爲的社會訊息處理型態。往後研究或可考慮同時測量多個社會訊息處理步驟。第

二，本研究發展的結構化訪談程序雖然可以穩定發現性別與遭遇間接攻擊行爲的情緒反應之關係，但是不同性別、不同同儕地位指標與間接攻擊行爲事件的反應評鑑歷程之間的關係卻尚無穩定而清晰的圖像；因此，本研究發展的結構化訪談程序仍待往後進一步蒐集各種不同的效度證據。再者，發展常模與基本率往往會改變不同年齡的測量效度（Dodge et al., 2006），而本研究發展的這套訪談程序目前尚未運用於青少年前期以外的受試者，因此，仍待往後進一步以不同發展階段的受試者爲研究對象，繼續累積此結構訪談程序之效度證據。

參考文獻

- 洪儷瑜、涂春仁（1996）。〈Coie & Dodge社會計量地位分類公式之修正〉。《測驗年刊》，43，103-114。
- 陳心怡、陳榮華、朱建軍（2001）。〈台灣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一般能力指標」之常模建立與運用〉。《測驗年刊》，48，89-104。
- 陳榮華（1997）。《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三版（中文版）指導手冊》。台北：中國行爲科學社。
- 黃曬莉（2005）。〈人際和諧與人際衝突〉。見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頁521-114。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Archer, J. (2004). Sex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in real-world settings: A meta-analytic re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8, 100-110.
- Archer, J., & Coyne, S. M. (2005). An integrated review of indirect, relational, and social aggression.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9, 212-230.
- Björkqvist, K. (1994).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ex Roles*, 30, 177-188.
- Björkqvist, K. (2001). Different names, same issue. *Social Development*, 10, 273-274.
-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 Kaukiainen, A. (1992). Do girls manipulate and boys figh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regard to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8, 117-127.
-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 Österman, K. (1992).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scales*. Finland: Åbo Akademi University.
- Björkqvist, K., & Niemelä, P. (1992). New trends in the

- study of female aggression. In K. Björkqvist & P. Niemelä (Eds.), *Of mice and women: Aspects of female aggression* (pp. 3-16).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 Kaukiainen, A.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trategies in males and females. In K. Björkqvist & P. Niemelä (Eds.), *Of mice and women: Aspects of female aggression* (pp. 51-64).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Björkqvist, K., & Österman, K., & Kaukiainen, A. (2000). Social intelligence – empathy = aggress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5*, 191-200.
-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Oommen, T. K., & Lagerspetz, K. M. J. (2001).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mong Hindu, Muslim, and Sikh adolescents in India. In M. Martinez (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ggression and the impact on its victims* (pp. 367-376). New York: Kluwer.
- Campbell, A. (1995). A few good me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female adolescent aggressio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6*, 99-123.
- Campbell, A. (1999). Staying alive: Evolution, culture, and women's intrasexual aggress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2*, 203-252.
- Coie, J. D., & Dodge, K. A. (1988). Multiple sources of data on social behavior and social status in the school: A cross-age comparison. *Child Development, 59*, 815-829.
- Crain, M. M., Finch, C. L., & Foster, S. L. (2005). The relevance of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girl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1*, 213-249.
- Crick, N. R.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The role of intent attributions, feelings of distress, and provocation typ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7*, 313-322.
- Crick, N. R. (1996). The role of overt aggress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prediction of children's future soci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7*, 2317-2327.
- Crick, N. R. (2006). How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early childhood advance the field.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 189-192.
-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74-101.
- Crick, N. R., & Grotpeter, J. K.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6*, 710-722.
- Crick, N. R., Grotpeter, J. K., & Bigbee, M. A. (2002). Relationally and physically aggressive children's intent attributions and feelings of distress for relational and instrumental peer conflicts. *Child Development, 73*, 1134-1142.
- Crick, N. R., & Werner, N. E. (1998). Response decision processes in relational and overt agg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69*, 1630-1639.
- Crick, N. R., Werner, N. E., Casas, J. F., O'Brien, K. M., Nelson, D. A., Grotpeter, J. K., et al. (1999). Childhood aggression and gender: A new look at an old problem. In D. Bernstein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pp. 75-141).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Crick, N. R., & Zahn-Waxler, C.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in females and males: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challeng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5*, 719-742.
- de Castro, B. O., Veerman, J. W., Koops, W., Bosch, J. D., & Monshouwer, H. J. (2002). Hostile attribution of int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73*, 916-934.
- Dodge, K. A., Coie, J. D., & Lynam, D. (2006).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youth. In W. Damon & M. L. Richard (Series Eds.) & N. Eisenberg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6th ed., pp. 719-788). New York: Wiley.
- Dodge, K. A., Lansford, J. E., Burks, V. S., Bates, J. E., Pettit, G. S., Fontaine, R., et al. (2003). Peer rejection and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74*, 374-393.
- Dodge, K. A., & Schwartz, D. (1997).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D. M., Stoff, J., Breiling, & J. D., Maser (Eds.), *Handbook of antisocial behavior* (pp. 171-18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Fontaine, R. G., Burks, V. S., & Dodge, K. (2002). Response decision processes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adolescent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4*, 107-122.
- French, D. C., Jansen, E. A., & Pidada, S. (2002). United States and Indonesia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reports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by disliked peers. *Child Development, 4*, 1143-1150.
- Galen, B. R., & Underwood, M. K. (1997). A develop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aggression amo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589-600.
- Graham, S., & Hudley, C. (1994). Attributions of aggressive and nonaggressive African-American male early adolescents: A study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 *Development Psychology, 30*, 365-373.
- Grotspeter, J. K., & Crick, N. R. (1996). Relational aggression, overt aggression, and friendship. *Child Development, 67*, 2328-2338.
- Henington, C, Hughes, J. N., Cavell, T. A., & Thompson, B. (1998). The role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identifying aggressive boys and girl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6*, 457-477.
- Hwang, K. 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 155-178.
- Kaukiainen, A.,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Österman, K., Salmivalli, C., Forsblom, S., et al. (1999).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intelligence, empathy, and three types of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25*, 81-89.
- Lagerspetz, K. M. J., & Björkqvist, K. (1994). Indirect aggression in boys and girls. In L. R. Huesmann (Ed.), *Aggressive behavior: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131-150). New York: Plenum Press.
-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 Peltonen, T. (1988). Is indirect aggression typical of femal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veness in 11- to 12-year old children. *Aggressive Behavior, 14*, 403-414.
- MacDonald, G., & Leary, M. (2005). Why does social exclusion hur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physical pa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 202-223.
- McEvoy, M. A., Estrem, T. L., Rodriguez, M. C., & Olson, M. L. (2003). Assessing relation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termethod agreement.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3*, 53-63.
- Newcomb, A. F., Bukowski, W. M., & Pattee, L. (1993).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popular, rejected, neglected, controversial, and average sociometric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99-128.
- Paquette, J. A., & Underwood, M. K. (1999). Young adolescents' experienc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counts of soci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5*, 233-258.
- Pellegrini, A. D., & Long, J. D. (2003). A sexual selection theory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sexual segreg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85*, 257-278.
- Prescott, K. (1996). Gender difference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aggressive behaviour: An edited interview with Kaj Björkqvist. *Australian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6*, 89-93.
- Richardson, D. R., & Green, L. R. (1999). Social sanction and threat explanations of gender effects on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25*, 425-434.
- Rosenthal, R., & Rosnow, R. L. (1991). *Essentials of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Rys, G., & Bear, G. (1997).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ssue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43*, 87-106.
- Sutton, J., Smith, P. K., & Swettenham, J. (1999a). Bullying and 'theory of mind': A critique of the 'social skills deficit' view of anti-social behaviour. *Social Development, 8*, 117-127.
- Sutton, J., Smith, P. K., & Swettenham, J. (1999b). Social cognition and bullying: Social inadequacy or skilled manipul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 435-450.
- Toldos, M. P. (2005). Sex and age differences in self-estimated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in Spanish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31*, 13-23.
- Tomada, G., & Scheider, B. H. (1997). Relational

- aggression, gender, and peer acceptance: Invariance across culture, stability over time, and concordance among informa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3*, 601-609.
- Underwood, M. K. (2003). *Social aggression among girls*.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 Underwood, M. K., Galen, B. R., & Paquette, J. A. (2001). Top ten challenges for understanding gender and aggression in children: Why c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Social Development*, *10*, 248-266.
- Vaillancourt, T. (2005). Indirect aggression among humans: Social construct or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In R. E. Tremblay, W. W. Hartup, & J. Archer (Eds.),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aggression* (pp. 158-177).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Werner, N. E., & Crick, N. R. (1999).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 college sampl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8*, 615-623.

The Response 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Findings from Childre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in a Culturally Chinese Context

Ming-Chuan Wang and Keng-Ling La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irect aggress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dvanced in recent years, past research still suffers from a few limitations. Firstly, data should be collected through methods other than questionnaires that dominate the recent findings. Secondly, research has yet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ocesses that lead to the emotions and the response evaluation while being victimized by indirect aggression in peer context. Thirdly, most prior studies focused on children in middle childhood, leaving the effect of indirect aggression on childre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less explored. Finally, the vast majority of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which may conceive the meaning of indirect aggression differently from culturally Chinese societies. Therefore, the specific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amine the response evaluation and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to victimization of indirect aggression among culturally Chinese children at the stage of early adolescence by means of a newly developed 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card-sorting procedures.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gender and peer status on the response evaluation was also of interest according to the effect-to-danger ratio hypothesis.

Fifty-six children nominated by their head teachers as popular or rejected (mean age = 11.60 years) participated in Study 1. During the interview, a vignette depicting indirect aggression was visually and auditorily presented, and then a series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including emotional reactions, were presented. Subjects' evalu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kind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was then probed through a deck of 15 cards each stating a strategy of indirect ag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nder by peer status interaction on response evalu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 rejected children enumerated marginally more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as effective than their popular counterparts. Study 1 also confirmed the effect-to-danger ratio hypothesis and showed that girls felt more troubled and sad than did boys in response to indirect aggression, while degree of anger revealed no gender differences.

Sixty children nominated by same-gender same-class peers as popular or rejected (mean age = 13.98 years) participated in Study 2, where the interview procedure was similar to Study 1 except for minor modifications. The number of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that popular and rejected subjects enumerated as effective was not different. Next, to take the statistical power issue into account, data from Study 1 and Study 2 were pool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jected subjects enumerated more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as effectively than their popular counterparts. Further, Study 2 fou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f peer status and gender on response evaluation. Compared with popular boys, rejected boys were more likely to adopt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indirect aggression. By contrast, rejected girls did not favor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more than popular girls. As for emotional reactions to victimization by indirect aggression, Study 2 replicated the findings in Study 1 that confirmed the effect-to-danger ratio hypothesis.

Study 3 attempted to further validate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by comparing the responses between children

designated through peer estimation technique as either highly or less indirect-aggressive and 72 children (mean age = 12.08 years) were recruited. Results indicated those who were highly indirect-aggressive did not enumerate more indirect aggression strategies as effectively than did the less aggressive counterparts. Furth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eer-estimated indirect aggression tendency and gender was not significant. It is suspected that the highly indirect-aggressive children might be better or at least not worse at social intelligence, which had buffered them from displaying biases or deficiencies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udy 3, again, replicated the findings in Study 1 and Study 2 that girls were more troubled and sad than boys but felt similar degree of anger compared to boys while being victimized by indirect aggression. Findings from the abov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both the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and the effect-to-danger ratio hypothesis. The incompatible results among the thre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Keywords: *indirect aggress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peer status, peer relationship,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